

档案与共同体记忆建构

连志英

[摘要] 共同体是基于共同特征联结而成的人类群体，它可为个体提供身份感、安全感及意义感，也可促进社会秩序的维系与社会整合。共同体的形成需植根于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共享记忆。共同体档案是共同体的过去媒介化后的记忆文本，因而是共同体记忆建构的重要媒介和工具。档案参与共同体记忆建构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包括档案的形成、捕获、组织、展演与聚合五个维度。共同体成员形成的记录需被捕获并被纳入共同体框架，经组织形成共同体档案，通过对共同体档案信息的挖掘、情感的传递，形成共同体档案叙事，并实现共同体过去在共同体内部的共享，从而建构起共同体记忆。不同共同体的档案也可相互聚合形成更大范围的共同体档案，通过对这些档案的展演，也可建构起更大范围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记忆，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和发展。

[关键词] 档案；共同体；共同体记忆；文件连续体；记忆连续体

“共同体”是当今哲学社会科学核心概念之一，任何个体都有内在的归属需求，都希望能在“共同体”中获得归属感、身份感及安全感，这也正是当今世界存在各种规模、各种形式的共同体的重要原因。共同体的建构不仅可满足个体的归属需求，同时也能实现社会整合，促进社会发展。而共同体的建构需扎根于共同体的过去，需要有共同体的共享记忆，这些共享记忆可促进共同体身份认同及其共同情感、共同价值观的形成。档案是原始的历史记录，是承载共同体记忆的重要文本，也是建构共同体记忆的媒介和工具。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及史学研究“记忆转向”的影响，档案学界也出现了“记忆转向”。档案被认为是建构集体记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要素，档案工作者被认为有责任通过自身的业务活动积极主动地参与集体记忆的建构、维护与传承，他们的观念、工作原则与方法对于集体记忆的真实、完整与鲜活会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①“记忆”“认同”“共同体（社群）”^②等范式成为继“证据”范式之后档案学的新范式。^③但对档案与共同体记忆之间的关系以及档案参与共同体记忆建构的机理目前尚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主要对共同体、共同体记忆及档案的概念进行梳理，探究档案与共同体记忆建构之间的关系，在借鉴文件连续体理论的基础上，建构记忆连续体模型，并以南京大屠杀档案为例阐释档案参与共同体记忆建构的机理。

作者：连志英，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教授，zhiyinglian@ruc.edu.cn。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社群档案记忆建构与传承研究”（20BTQ101）阶段性成果。匿名审稿人提供了专业细致的审稿意见，在此谨表诚挚谢意。当然，文责自负。

① 冯惠玲：《档案记忆观、资源观与“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建设》，载《档案学通讯》，2012（3）。

② 英文“community”在档案学界常被翻译为“社群”，本文中的“共同体”和“社群”具有相同的意涵。

③ T. Cook. “Evidence, Memory, Identity, and Community: Four Shifting Archival Paradigms”. *Archival Science*, 2013, 13 (2-3): 95-120.

一、共同体和共同体记忆内涵

（一）共同体的概念及其特征

对共同体的研究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的共同体的形成都旨在追求某种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追求的是至善。^① 之后不同时期，哲学社会科学界对共同体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形成了多元复杂的共同体概念。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共同体和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中对“共同体（Gemeinschaft）”的概念进行了深入分析，他将“共同体”和“社会”相对立，强调共同体是关系型共同体，是基于自然意志，如情感、习惯、记忆等，以及基于血缘、地缘和心态而形成的一种社会有机体，具体包括地域共同体、血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② 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罗密斯将滕尼斯的“Gemeinschaft”译为英文“community（共同体）”，使之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概念。美国芝加哥学派特别强调共同体的地域性含义，这一含义为我国社会学所沿用，并将“community”翻译为“社区”，意指以地区为范围、在地缘基础上结成的互助合作的群体，用以区别在血缘基础上形成的互助合作的亲属群体。^③ 进入后现代社会之后，一些学者认为共同体不再是实体共同体，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了“想象共同体”的概念，强调共同体并不是因为与任何“真实存在的”群体标识有实际的联系，而是因为它被想象的方式而被界定。^④ 约翰·瓦尔什和史蒂文·海也认为“共同体”具有想象性，并兼具互动性和过程性，强调共同体的建构是一个社会过程，是在社会网络的互动中被再生产，并通过符号和象征在共同体内部或外部的想象中被再现，故任何基于客观存在的或社会建构的具有共同的身份和历史的群体都是想象的共同体。^⑤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共同体主义（communitarianism，也常译为社群主义）在对自由主义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对共同体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们深受亚里士多德和滕尼斯等有关共同体思想的影响，认为真正的共同体是一种构成性共同体，即个人所属的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个人的自我认同，而且共同体也为其成员提供思维、行为、判断和生活的基本背景，这种构成性共同体本身已成为一种善，个人只有通过共同体，生命才有价值，生活才有意义。^⑥ 而为回应自由主义对共同体主义的批评，行动共同体主义的代表性人物爱茨尼提出了“回应的共同体”概念，强调共同体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共同体须是一群个体之间充满感情、彼此交织且相互强化的关系网络，即共同体具有互动性和共同的情感；二是共同体需要有对一套共享的价值、规范与意义及对一种共享的历史和认同——简言之即一种共享的文化——的承诺，即共同体具有共享的价值观、共享的历史和共享的认同。^⑦ 此外，共同体主义还强调共同体是将善优先于权利，强调共同体要追求共同的善，共同的善并不是具有排他性的利益追求，而是具有公共利益的善。^⑧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了社群档案运动（community-based archives），“共同体（社群）”成为西方档案学的新范式。一些档案学者也对“共同体（社群）”概念进行了界定，如社群档案研究的代表性人物、英国档案学者安德鲁·弗林和他的同事们在对英国社群档案发展的历

①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② 滕尼斯：《共同体和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52-54、65页，商务印书馆，1999。

③ 费孝通：《当前城市社区建设一些思考》，载《群言》，2000（8）。

④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 2006, pp. 6-7.

⑤ J. Walsh, and S. High. "Rethinking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Histoire Sociale/Social History*, 1999, 32 (64): 255-273.

⑥ M. Sandel.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 of Jus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49-151.

⑦ E. Amitai. "The Responsive Community: A Communitarian Perspectiv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6, 61 (1): 1-11.

⑧ A. MacIntyre. "Politics, Philosophy and the Common Good". In K. Knight, and N. Dame (eds.). *The MacIntyre Reader*.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8, pp. 239-240.

史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将“共同体(社群)”界定为基于共同身份或共同兴趣组成的群体^①,也强调共同体的构成性和想象性。

由此可见,不同时期不同学科和领域的学者对共同体的认知有所不同,但这些认知却有着一些共性,即都认为共同体是作为一种善而存在,而且共同体的形成是为了追求共同的善。美国学者雷蒙·威廉斯指出,不像所有其他的社会组织的词汇(例如国家、民族、社会等),共同体似乎从来没有负面的意涵。^② 本文认为共同体是基于各种主观或客观的共同特征联结而成的人类群体,他们具有共同的情感、共享的价值观、共享的历史与认同,因此,小到家庭、大到国家和民族甚至全人类都可以被称为共同体。无论是对于个体还是对于共同体自身还是对于社会,共同体的存在都具有积极意义:对于个体而言,共同体可为个体提供安全感、意义感和认同感;对于共同体自身而言,共同体可实现群体认同和公共利益;对于社会而言,共同体可促进社会秩序的维系与社会整合。

(二) 共同体记忆的内涵

共同的情感、共享的价值观、共享的历史与认同是建构共同体的重要基础,这些都与共同体记忆密切相关。共同体记忆可唤起共同体成员共同的情感,可使共同体成员获得共享的历史与认同,并形成共享的价值观,故任何一个共同体都是“记忆共同体”。共同体记忆也是一种集体记忆,是有关共同体的集体记忆。自20世纪2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发表有关集体记忆的论著以来,“集体记忆”已经成为人类学和社会学所关注的议题。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是一个建构的过程,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并且在个体记忆之中体现自身,他强调“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从而,我们的个体思想将自身置于这些框架内,并汇入到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中去”^③,而“记忆的集体框架也不是依循个体记忆的简单加总原则而建构起来的,它们不是一个空洞的形式,由来自别处的记忆填充进去,相反,集体框架恰恰就是一些工具,集体记忆可用以重建关于过去的意象,在每一个时代,这个意象都是与社会的主导思想相一致的”^④。

美国犹太裔哲学家阿维夏伊·玛格利特沿袭了哈布瓦赫有关集体记忆并不是个体记忆的简单相加的观点,他将共享记忆与共同记忆做了区分,指出共同记忆是一个集合观念,它集中了经历并记住某一事件的所有人的记忆。在特定社会,如果记住事件的人的比例超过一定的临界点(他们中的大多数、压倒性多数、70%以上等等),我们就把对事件的记忆称为共同记忆。而共享记忆不是个人记忆的简单相加,它需要内部之间的交流。共享记忆将记住事件的人的不同视角整合并调整为一个完整的记忆版本。当时不在场的共同体的其他成员,通过描述而非直接体验分享了亲历者的记忆。^⑤ 他提出共享记忆是建立在记忆的劳动分工基础上的,记忆的劳动分工包括记忆的共时性劳动分工和记忆的历时性劳动分工,其中共时性劳动分工完成了记忆在同代人之间的共享,而历时性劳动分工则实现了记忆的代际传递。^⑥

共同体记忆是共同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是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共享记忆,但它并不是其成员个人记忆的简单相加,在建构共同体记忆过程中,共同体会基于现实环境和现实需要,对其成员的个体记忆进行选择、组织和阐释,故共同体是为其成员个人记忆提供背景信息的记忆框架,分散的、独立的共同体成员的个人记忆只有被置于或被纳入共同体这个记忆框架中,与其他共同体成员的个人记忆组织在一起,并实现记忆的内部共享,才能建构起共同体记忆。

① A. Flinn, et al. "Whose Memories, Whose Archives? Independent Community Archives, Autonomy and the Mainstream". *Archival Science*, 2009 (9): 71-86.

②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8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③④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69、7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⑤⑥ A. Margalit. *The Ethics of Mem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51-52, pp. 58-59.

二、档案的概念及其与共同体记忆建构之间的关系

（一）档案的概念及其后现代转变

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对档案概念的界定有所不同，但一般而言都强调档案是原始的历史记录，认为其具有原始性、记录性、历史性及关联性，如我国 2020 年修订的《档案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从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科技等方面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但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在“共同体（社群）”范式下，档案学界对于档案概念的理解出现了转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档案概念的多元化。如澳大利亚档案学者苏·麦克米什认为，在共同体（社群）的语境和背景下，“档案”包括口头的和书面的文件，还包括文学作品、景观、舞蹈、艺术、人造的环境及手工艺品等，这些都是共同体及其成员生活留下的痕迹，是反映共同体及其成员生活的证据和记忆。对共同体（社群）而言，这些都是值得保存的“档案”。^①这种档案观与传统的档案观存在较大差异，有人也许会质疑将实物、文学作品、口述及手工艺品称为档案是否合适，以及这些被称为“档案”的事物是否具有档案价值及是否具有可靠性和真实性。^②但随着西方社群档案运动的发展，西方档案学界已普遍接受在共同体（社群）的范式下，某一或某些事物是否是档案并不是以主流档案机构的档案工作人员或主流档案机构所制定的标准来决定的，而是应该尊重共同体成员的声音，对于共同体成员而言，这些事物是他们生活的证据和记忆，被共同体成员认为是他们的档案，那么就可以称之为共同体的档案。因此，这个世界存在多元的档案宇宙，不同的档案宇宙中存在不同的档案本体论和认识论，而这些不同的档案本体论和认识论之间往往是不可通约的。^③

笔者较认同苏·麦克米什的观点，认为在共同体背景下，档案可指共同体及其成员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各种形式的记录，包括文字、口述、实物、声像、仪式、舞蹈等。而这里的“形成”包括直接形成和共同形成两种形式：所谓直接形成是指共同体成员自己生产、创造的证据和记忆的痕迹，如共同体成员的日记、信件，以及生产创作的手工艺品、仪式、口述等；而共同形成则是指某些记录并非是由共同体成员直接生产、创造的，而是由其他主体直接形成但内容涉及共同体成员。这些“他者”所直接形成的记录是有关该共同体的记录，是从“他者”的视角形成的有关共同体的过去的证据，也应是共同体档案的组成部分。对于共同形成的档案，共同体及其成员是这些档案的共同形成者。安·吉利兰德教授将共同形成者定义为那些文件及其元数据形成过程中所涉及的官方形成者以外的主体、受害者、贡献者及遗产继承者等。^④承认共同体成员在“他者”所形成的档案中的共同形成者的地位是为了赋予他们在其共同形成的档案的管理、开发及利用中的权利，对于共同形成的档案，共同形成者享有对这些档案进行管理、开发和利用的权利。

二是对档案概念的理解出现了“情感转向”。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受实证主义范式及工具理性的影响，档案学界主要将档案视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自然而然形成的客观的、中立的、不带任何情感的产物，是实现人类各种目的的客观的、中立的工具，由此特别突出和强调档案的证据价值、业务参考价值、信息价值等。但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有学者将情

① S. McKemmish. "Traces: Document, Record, Archive, Archives". In S. McKemmish, et al. (eds.). *Archives: Record Keeping in Society*. Centre for Information Studies, Charles Sturt University, 2005, pp. 1-20.

② W. Maher. "Archives, Archivists, and Society". *The American Archivist*, 1998, 61 (2): 252-265.

③ The Archiv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AERI). "Pluralizing the Archival Curriculum Group (PACG). Educating for the Archival Multiverse". *The American Archivist*, 2011 (74): 69-101.

④ A. Gilliland. "Contemplating Co-creator Rights in Archival Description". *Knowledge Organization*, 2012 (5): 340-346.

感理论引入档案学,认为情感是身体(个人的或群体的)与世界产生关系(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力量,情感内化于档案,档案承载了情感、再现了情感并会促使情感的产生,故任何档案都会产生情感,并能使之有接触、有关联的人产生情感体验。^①一些学者对档案对特定群体及其身份认同形成的情感影响开展了研究,如哈里斯·哈利洛维奇通过对波斯尼亚种族大屠杀幸存者对文件及记忆保存的情感及具象的重视的研究,强调当幸存者努力想要重构他们的过去、重申他们的身份、重建并维持其连续性时,不管是个人文件还是社群文件对于幸存者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②杰奎琳和弗兰克基于他们作为被迫离家被政府收养的儿童的经历,对作为成年人获取这些档案所产生的情感影响,特别是这些文件唤醒过去的创伤的能力进行了详细阐释,他们认为如果诠释档案的过程要能维护作为档案的对象的那些人的尊严,并确保档案研究的完整性,经历档案中所涉及事项的人的直接参与是至关重要的。^③

神经系统科学研究也表明在人类的大多数活动中,情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档案是人类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形成者在形成档案的过程中也会注入情感,这些情感可能会通过档案的体裁、修辞等表达出来,任何主体与这些档案进行交互时也会被触发情感,这些情感可能满足主体某方面的情感需求,也可能成为促使主体采取行动的动力。因此,档案具有情感价值,这种情感价值也会促使共同体成员共同情感的形成,有助于促进共同体记忆的建构。

(二) 档案与共同体记忆建构之间的关系

共同体记忆也是集体记忆,而集体记忆是通过一种再现的过程,将过去的经验“意义化”“象征化”后的产物,人们也因此能从未曾亲身经历或遥远的事件中产生特定意义的关系,这些过去就是一种记忆。^④在这一“再现”过程中,要将过去的经验“意义化”“象征化”就需借助记载了“过去的经验”的媒介。王明珂指出:“集体记忆有赖某种媒介,如实质文物及图像、文献,或各种集体活动来保存、强化或重温。”^⑤共同体档案记载了共同体的过去,是建构这一再现过程的重要媒介,通过将共同体档案中所记载的过去的经验意义化、象征化,就可实现对过去的再现,建构起共同体记忆。荷兰档案学者埃里克·卡特拉提出共同体植根于记录共同体活动及形成共同体记忆的共同的过去,要成为一个共同体,无论是家庭、宗教共同体或某一职业共同体都涉及要植根于记忆文本(包括文字的、口述的、物理的等各种形式),因为通过记忆文本,过去才能得以重现,而档案是其中重要的记忆文本。^⑥美国档案学者珍妮特·巴斯蒂安特别指出,没有自己的文件/档案的共同体是被围困的共同体,没有坚实的可立足的基础以维护自身、维护身份认同及维护其历史。^⑦

因此,档案是共同体的过去媒介化后的记忆文本,是建构共同体记忆的媒介和工具,而档案记忆文本中的信息和情感是建构共同体记忆的重要因素。诚如保罗·康纳顿所言,社会是有记忆的,人们通常会借助信息的选择、解释和重现来形成社会记忆以构建与过去的联系,使过去的形象适合于现在的信仰与精神需求。^⑧档案蕴藏了有关共同体过去的信息,通过对这些信息

① M. Cifor. "Affecting Relations: Introducing Affect Theory to Archival Discourse". *Archival Science*, 2016, 16 (1): 7-31.

② H. Halilovich. "Re-imaging and Re-imagining the Past after 'Memoricide': Intimate Archives as Inscribed Memories of the Missing". *Archival Science*, 2016, 16 (1): 77-92.

③ Z. Jacqueline, and G. Frank. "Latent Scrutiny: Personal Archives as Perpetual Mementos of the Official Gaze". *Archival Science*, 2016, 16 (1): 93-109.

④ 萧阿勤:《集体记忆理论的检讨:解剖者,拯救者,与一种民主观点》,载《思与言》,1997(1)。

⑤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2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⑥ E. Ketelaar. "Sharing: Collected Memories in Communities of Records". *Archives and Manuscripts*, 2005 (5): 44-61.

⑦ J. Bastian. *Owning Memory: How a Caribbean Community Lost Its Archives and Found Its History*. Libraries Unlimited, 2003, p. 87.

⑧ P. Connerton. *How Societies Rememb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96-101.

的选择、解释和重现可再现共同体的过去，建构起共同体的记忆。同时，记忆和情感是交织的，社会记忆可被视为社会成员对历史的一种情感体验过程。^① 档案不仅蕴藏了有关共同体过去的信息，同时也储存了共同体过去的情感，通过信息和情感的传递可使共同体成员产生情感的共鸣，唤起共同体共同的情感，促进共同体记忆的建构。因此，通过对档案文本中的信息的挖掘及情感的传递可建构共同体记忆，促进共同体的发展，而共同体的发展也会促进新的共同体档案的形成，这些档案又会参与共同体记忆建构中，进一步丰富和延续共同体记忆，促进共同体的发展（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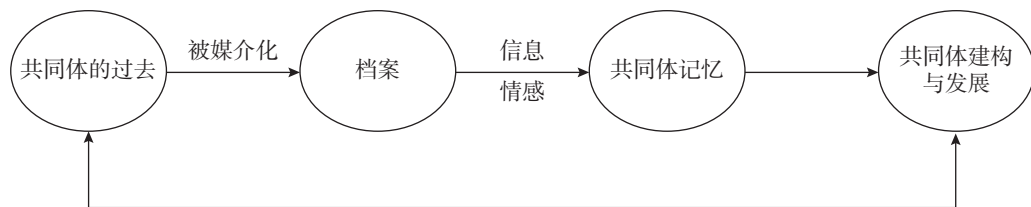


图 1 档案与共同体记忆建构之间的关系

三、档案参与共同体记忆建构的机理

共同体记忆是在其成员个体记忆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因此档案参与共同体记忆建构是自下而上地建构记忆的过程，同时，由档案与共同体记忆建构的关系可以看出，档案参与共同体记忆建构是一个连续性过程，具有时空延伸性。在此，借鉴文件连续体理论模型，建构记忆连续体模型，以阐释档案参与共同体记忆建构的过程和机理。

（一）文件连续体理论模型的构成

文件连续体理论是由澳大利亚档案学者弗兰克·阿普沃德和苏·麦克米什等于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的文件管理的新范式。该理论借鉴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建构了一个四维模型以阐释文件运动的时空延伸性，并揭示自下而上地建构集体记忆的过程。该模型共有四个轴，分别代表文件管理的四个重要方面：身份（人类行为活动的主体）、互动（人类的行为活动）、证据（人类行为活动形成的信息）和文件管理存储器（人类行为活动所形成的信息的存储工具），每个轴上均有四个坐标，四个坐标相互关联，由此形成了四维：形成维、捕获维、组织维及聚合维（或称多元维）（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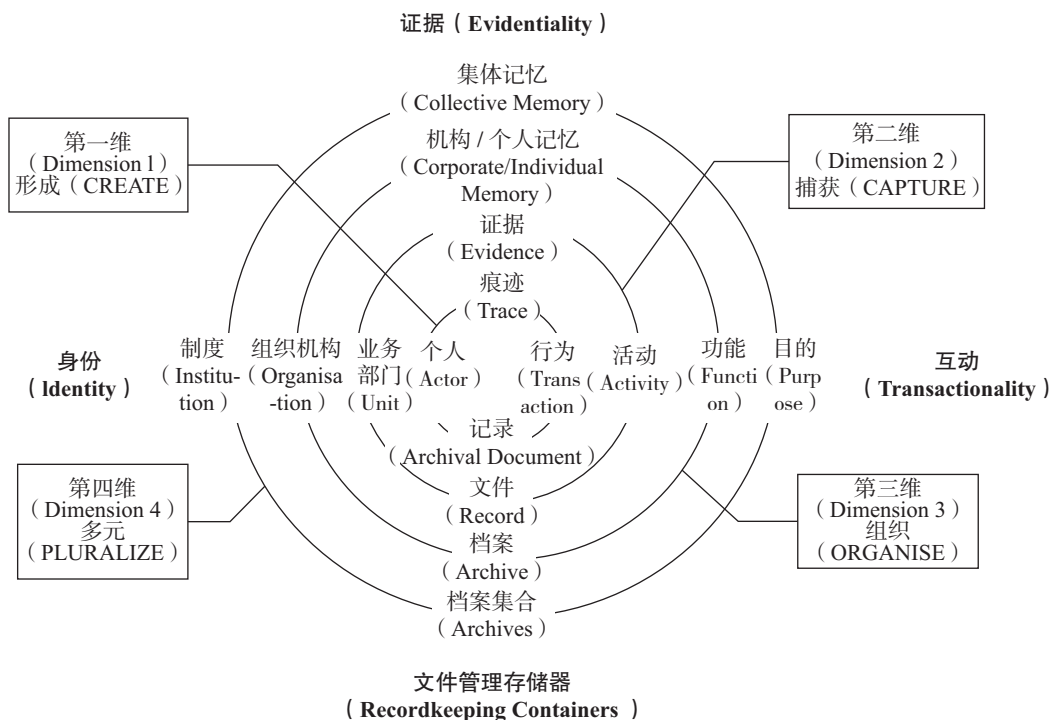
形成维描述的是个人层面的文件形成及保存行为，即行动者个人在从事业务或事务过程中形成了记录，这些记录是其行为的痕迹。

捕获维是指将行动者个人所形成的记录捕获进某一文件管理系统。^② 对一个业务部门而言，将其部门每个行动者在业务活动中所形成的记录捕获进业务部门的文件管理系统，就形成了这个业务部门业务活动的文件，这些文件是业务部门业务活动的证据；而对于个人而言，将其在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记录捕获进个人文件管理系统，就形成了行动者个人从事社会活动的文件，这些文件是个人社会活动的证据。“捕获”包含了“选择”的意涵，因为捕获的须是有保存价值的记录，同时还要捕获记录元数据，并建立记录之间的关联，使记录成为完整的、具有关联的文件。

组织维是指对捕获的文件进行整理、编目和保存等。对于一个组织机构而言，将其各业务部门

① 丁华东：《档案与社会记忆研究》，282 页，人民出版社，2016。

② 这里的“文件管理系统”被宽泛地定义为将文件作为证据、记忆及可信信息来源进行管理的正式的及非正式的文件管理过程，参见 S. McKemmish. “Recordkeeping in the Continuum: An Australian Tradition”. In A. Gilliland, et al. (eds.). *Research in the Archival Multiverse*. Monash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139.

图2 文件连续体理论模型^①

的文件加以组织，就形成了这个组织机构的档案，这些档案是组织机构的记忆；而对个人而言，将其所捕获的个人文件加以组织就形成了其个人档案，这些档案是个人的记忆。这些档案和记忆反映了这个组织机构或行动者个人在社会中的功能和角色。

聚合维是指将各个组织机构或行动者的档案聚合在一起形成档案集合。这些档案集合构成了集体记忆，能反映某一社会制度的概况、目的及功能等。

这四维充分体现了文件运动的时空延伸性：自内向外看，文件连续体模型如涟漪般向外延展，“形成维”可视为文件运动时空延伸性的开始，行为者在特定时空实施了行为，产生了“记录”，但记录尚未与其形成背景及其他相关的记录之间建立起关联。而一旦记录被捕获进“文件管理系统”，建立起各种关联，成为“文件”，它就与其最初的形成时空相脱离，可独立存在于其他时空，并能实现跨越时空的利用和诠释，同时，文件在时空中也具有多重生命，可同时作为证据、机构或个人记忆以及集体记忆而存在。自外向内看，每个维可视为级联区域，作为集体记忆的文件也可能螺旋式地向内促使相关文件的形成、捕获和组织。

(二) 记忆连续体模型的建构

文件连续体理论虽然涉及对档案参与集体记忆建构的过程的描述，但未能揭示这一过程背后的机理，而且，只是将个人或组织机构所形成的档案进行捕获、组织及聚合并不意味着就建构起集体记忆，因为档案并不等同于记忆，档案是记忆文本，只有通过对其所承载的信息及情感进行挖掘以“再现”过去，并实现这种“再现”的共享，才能建构起集体记忆。因此，笔者在参考文件连续体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根据档案与共同体记忆建构之间的关系，建构了记忆连续体模型。该模型也是

^① S. McKemmish. "Recordkeeping in the Continuum: An Australian Tradition". In A. Gilliland, et al. (eds.), *Research in the Archival Multiverse*. Monash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138.

由四个轴组成，分别代表了档案参与共同体记忆建构的四个重要方面：身份（记忆建构的主体）、互动（记忆建构的活动）、证据和记忆（记忆建构形成物）及记忆存储器（记忆建构形成物的存储工具），每个轴上相应五个坐标，这些坐标相互关联，形成了五维：形成、捕获、组织、展演及聚合，每一维都有新的内涵，它们共同阐释了档案参与共同体记忆建构的过程和机理（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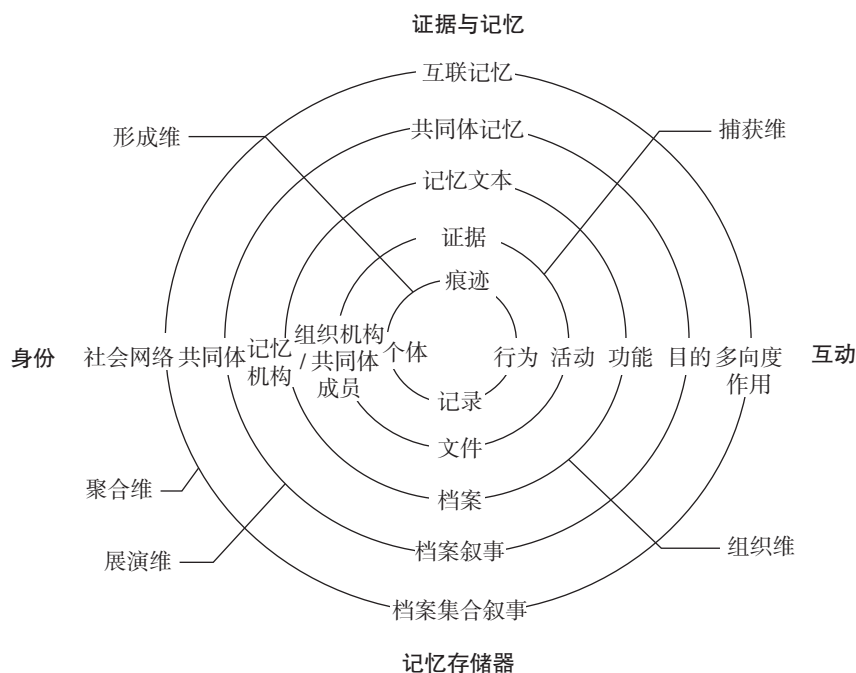


图3 记忆连续体模型

第一，形成维。“共同体”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任何共同体都是由一个个实实在在存在的个体组成的，因此，共同体档案也是由共同体成员所形成的个人记录所组成的。共同体档案的形成包括直接形成和共同形成两种形式，因此，形成维包括共同体成员个体在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直接形成的记录，也包括共同体以外的个体所形成的有关共同体及其成员的记录。这些记录是这些主体实施行为的痕迹。

第二，捕获维。即对共同体成员所形成的记录进行收集、鉴定，这也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共同体成员所形成的记录或他者所形成的有关共同体及其成员的记录大多分散保存在个人或一些组织机构手中，需要将这些分散保存的记录捕获进共同体框架中，形成共同体文件，这些文件是共同体活动的证据。这一选择过程直接决定了最终将建构起什么样的记忆。共同体文件的选择过程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权力因素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苏·麦克米什和安·吉利兰德等指出：“档案的鉴定、收集、整理、著录、保存及获取都与记忆和遗忘、包容与排斥的社会过程及它们所体现的权力关系紧密相关。”^① 因此，要建构共同体的记忆，共同体成员就须享有和控制对共同体文件的选择权。除了权力因素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包括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及共同体的现实需要等也会影响到共同体文件的选择，因为任何记忆都是基于现实对过去的建构或重构，共同体及其成员所处的现实环境、现实需求或诉求等现实因素都会影响到共同体文件的选择。

第三，组织维。即对所捕获的共同体文件进行整理、著录、编目、保存等。经过组织，分散的

^① A. Gilliland, et al. “‘Communities of Memory’: Pluralizing Archival Research and Education Agendas”. *Archives and Manuscripts*, 2005, 33 (1): 146-174.

共同体成员个体的文件才能与其他共同体成员的文件联结起来,由此形成较完整的共同体档案,这些共同体档案是建构共同体记忆的重要文本。因此,共同体是为其成员所形成的文件提供背景信息的框架,分散的、独立的共同体成员的个人文件只有被置于或被纳入共同体框架中,并与其他共同体成员形成的文件组织在一起,建立和维护这些文件之间的有机联系,才能形成共同体档案。这也意味着需要有专门的管理机构比如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来保存及管理共同体档案,这些机构也因此被称为记忆机构,它们不仅仅只是共同体档案的保存空间,它们也是共同体的“记忆之场”,是“接触地带”,共同体成员的声音、叙事、话语在此交汇,一起建构起共同体记忆。阿维夏伊·玛格利特特别指出:“现代社会的共享记忆是通过机构(如档案馆),以及公共纪念设施(如纪念碑或街道的名称)等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传播。”^① 现代的记忆机构包括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是记忆得以共享与传播的重要场域。因此,通过组织,共同体成员所形成的个体文件成为完整的及可长期保存和可用的共同体档案,这为共同体记忆的建构提供了文本基础,而共同体档案的保管机构则为共同体记忆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场域。

第四,展演维。即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和工具对共同体档案的信息进行挖掘和呈现,以再现共同体的过去,唤起共同体的共同情感,建构共同体记忆。共同体记忆是通过再现的过程,将过去的经验“意义化”“象征化”后的产物。因此,共同体档案的展演是建构共同体记忆的重要途径,只有通过展演,共同体档案中所蕴藏的信息和情感才能被激活、被传递,共同体的过去才能被再现和共享。共同体档案展演有很多种形式,最常见的有共同体档案展览,即按一定的主题组织并展示共同体档案,再现共同体的过去,共同体成员进入共同体档案展览的特定场域,通过观看、接触再现的过去,并被触发共同的情感,从而实现共同体成员之间的记忆共享,建构起共同体记忆。此外,共同体档案展演还包括档案编研及利用各种信息技术包括可视化技术、VR、AR技术等对档案信息进行开发,以再现共同体的过去。共同体档案展演实质上是一种档案叙事。“叙事是一种讲述性的、表演性的行为事件,是编故事、讲故事的过程……我们没法直接走入同样的经历,我们只能通过再现,通过讲述故事的方式,来研究过去的经历。”^② 共同体档案展演正是通过叙事再现共同体的过去,并使之在共同体成员之间进行历时性或共时性的共享,最终建构起共同体记忆。

第五,聚合维。即将若干共同体档案聚合为大的共同体档案,这是因为在社会网络中还存在“共同体的共同体”,即某一大共同体是由若干小共同体组成,比如国家共同体是由若干个家庭共同体组成,若干个小的共同体档案可聚合成档案集合,大的共同体便是档案集合的框架,通过对档案集合进行展演形成档案集合叙事,将此档案集合叙事在大的共同体中进行共享便可建构起大的共同体记忆,这种共同体记忆也是一种互联记忆。聚合维也印证了迈克尔·罗斯伯格提出的记忆的多向度作用理论^③,即不同群体的记忆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共生共促的关系。

档案参与共同体记忆的建构也具有时空延伸性,即个体所形成的记录被捕获进某一特定共同体框架时,它既可以与同一时空的共同体成员所形成的文件组织在一起,也可以与不同时空的共同体成员所形成的文件组织在一起,形成共同体档案,通过展演,建构起共同体记忆。另外,因为个体有可能同时属于不同的共同体,比如个人可同时属于家庭共同体、社区共同体及国家共同体,因此,个体所形成的记录也可同时被捕获进不同共同体框架,与不同的共同体成员同一时空或不同时空所形成的文件组织在一起,形成不同共同体的档案,通过展演,建构不同的共同体记忆。而某一共同体档案除了可建构该共同体记忆外,也可同时与其他共同体档案聚合成一个大的共同体档案,

① A. Margalit. *The Ethics of Mem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54.

② 诺曼·K. 邓金:《解释性交往行动主义:个人经历的叙事、倾听与理解》,64页,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

③ M. Rothberg. "From Gaza to Warsaw: Mapping Multidirectional Memory". *Criticism*, 2011, 53 (4): 523-548.

通过展演，建构起大的共同体记忆。

（三）档案参与共同体记忆建构机理实证分析

笔者在此选取南京大屠杀档案为例，以具体阐释记忆连续体模型所展示的档案参与共同体记忆建构的机理。

南京大屠杀档案是记载侵华日军在南京制造大屠杀惨案的罪恶事实和日军侵占南京期间犯下的大量罪行的真实的、原始的记录。2015年10月9日，由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7家单位联合申报的11组南京大屠杀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这11组档案包括：身处国际安全区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程瑞芳日记，美国牧师约翰·马吉16毫米摄影机及其胶片母片，南京市民罗瑾、吴璇冒死保存下来16张侵华日军自拍的屠杀平民的照片，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谷寿夫判决书的正本以及当时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词等。南京大屠杀档案是建构南京大屠杀记忆的重要文本，南京大屠杀记忆已成为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是中国国家共同体的共享记忆，而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也意味着南京大屠杀记忆向人类共同体记忆迈出了重要一步。从这一过程中可清晰看出档案参与共同体记忆建构的机理。

首先是形成维。现今所保存的南京大屠杀档案既包括当时身处南京沦陷区的南京市民直接形成的记录，如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11组南京大屠杀档案中的程瑞芳日记以及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词等，也包括其他人（即他者）形成的记录，如南京市民罗瑾、吴璇冒死保存下来的16张侵华日军自拍的屠杀平民的照片，以及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大屠杀胶片母片及其当时使用的16毫米摄影机，这些记录都属于共同形成的档案，即这些档案是他者（包括实施暴行的日本侵略者及当时身处南京沦陷区的国际友人）直接形成的，它们是“他者”行为的证据，也是从“他者”的视角对共同体成员的历史和命运的记录。

其次是捕获维。南京大屠杀的记录也是分散保存在个人或一些组织机构手中，如约翰·马吉所拍摄的南京大屠杀日军罪行的胶片及摄像机保存在其子大卫·马吉手里，16张侵华日军自拍的屠杀平民的照片辗转保存在吴璇手中，侵华日军所形成的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记录要么保存在日本相关的机构，要么保存在侵华日军个人手里，还有很多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则是印刻在南京市民及见证侵华日军罪行的国际友人的脑海里，因此，需要对这些记录采取措施进行捕获，包括及时收集和广泛征集这些记录，对亲历者进行口述记录等。而不同时期因为国内外的政治环境及现实需要的不同，对南京大屠杀档案的捕获重点也会有所不同，比如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配合中外军事法庭的审理，调查侵华日军在南京所犯的罪行，南京市政府及相关机关先后成立了“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等专门调查机构，对日军在南京所犯罪行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收集了大量南京大屠杀档案。^①这一时期捕获南京大屠杀档案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军事法庭的审判提供证据，捕获的主要是证人证言、日军所犯罪行的调查统计等材料。20世纪50年代基于阶段斗争的立场和现实需求，南京市政府侧重挖掘大屠杀期间南京军民反抗的典型个案，以发扬民族气节，并引导群众进行仇视、蔑视、鄙视美国的观念^②；而基于今天铭记历史、不忘国耻、促进和平的立场和现实需求，各个记忆机构，特别是在南京大屠杀记忆建构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侵华日军南京遇难同胞纪念馆则从多种渠道包括从受害方、加害方及中日双方以外的第三方处捕获更为全面反映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记录。

^① 《搜集证据 调查罪行——抗战胜利后南京市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调查》，见 http://dag.weihi.gov.cn/art/2021/12/13/art_26350_2750936.html。

^② 刘燕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载《抗日战争研究》，2009（4）。

第三是组织维。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档案现主要保存在专门的记忆机构,如联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6家国家档案馆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这些机构对捕获的南京大屠杀档案进行了组织、整理和妥善保管,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对其捕获和保存的南京大屠杀档案进行了数字化,并建有档案管理系统对数字档案进行现代化管理,同时,也建有现代化的库房保管纸质档案和实物档案等。^① 这些经过组织的档案共同构成了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文本,而这些记忆机构也成为“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记忆之场”,通过这些文本和场域,中国国家共同体有关南京大屠杀的集体记忆才能得以建构。

第四是展演维。展演是通过传递信息、唤起情感共鸣,实现共同体记忆共享、建构共同体记忆的重要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20世纪80年代,南京大屠杀档案虽有一些被捕获并保存在记忆机构,但受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影响,特别是受国家对日外交政策的影响,对南京大屠杀档案缺乏深入的研究和开发,未能形成对南京大屠杀的系统的、全面的叙事,甚至在20世纪60年代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进入了一段相对“沉寂”期。^② 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日本教科书事件,国内开始重视对南京大屠杀记忆的建构,记忆机构也加强了对其保存的南京大屠杀档案的研究和开发,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常设有“南京大屠杀史实展”,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档案包括文字材料、照片、实物、口述等按照时间顺序组织为8个主题,形成了南京大屠杀的全面的历史叙事,并通过在线及实体展厅进行展览。进入虚拟或现实展厅的任何一个中国人,在观看这些档案时不仅会获得南京大屠杀这段过去的信息,同时也会被激发起共同的情感,通过这些信息和情感的交织,实现了南京大屠杀这段过去在中国国家共同体之间的共享,从而建构起中国国家共同体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共享记忆。

第五是聚合维。南京大屠杀档案在参与建构中国国家共同体记忆的同时,也可参与更大范围的共同体记忆建构,如南京大屠杀档案可与犹太大屠杀档案及其他国家反法西斯的档案聚合起来,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档案聚合,通过对这个大的档案聚合的信息和情感的挖掘和再现,可建构起全世界或全人类这个更大的共同体的共享的反法西斯记忆。因此,中国人的南京大屠杀记忆与犹太人的大屠杀记忆以及世界其他共同体的反法西斯记忆之间也是共生共促关系,它们互联互通,可建构起人类共同体的反战记忆。而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也说明南京大屠杀档案不仅可被纳入中国国家共同体框架,建构中国国家共同体记忆,也可同时被纳入世界共同体框架,建构世界和人类共同体记忆。

四、结语

共同体档案是承载共同体记忆的重要文本,是建构共同体记忆的重要工具。共同体档案是由共同体成员直接形成和共同形成的记录组织而成,但并不是共同体成员个人所形成的记录的简单相加,共同体为共同体档案的形成提供了框架,只有根据这个框架被捕获并被组织的共同体成员形成的记录最终才会成为共同体档案。记忆的建构需要通过通过对过去的再现并在共同体成员之间进行共享才能得以实现,因此,需要运用各种信息技术手段和工具对共同体档案所蕴藏的内容进行挖掘,以再现共同体的过去,激发共同体的共同情感,实现对共同体过去的共享。由此可见,档案参与共同体记忆的建构是“从在场经过不在场,到再在场——再存有或者再现的过程”^③。当然,共同体记

① 徐康英:《论南京大屠杀史料的征集、馆藏与利用》,载《南京大屠杀研究》,2012(4)。

② 王卫星:《八十年来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载《南京社会科学》,2017(8)。

③ H. G. 梅勒:《中西哲学传统中的记忆与遗忘》,载丁祯彦编著:《时代与思潮(7)——20世纪末的文化审视》,214-229页,学林出版社,2000。

忆的建构也会反作用于共同体档案的形成、捕获、组织、展演及聚合，因为共同体记忆的建构可促进共同体的发展，使得共同体成员认识到共同体档案的重要性，从而会促使共同体档案的持续生产，也会促进共同体记忆的持续建构与传承。

本文仅选取南京大屠杀档案为例以阐释档案参与共同体记忆建构的过程和机理。实践中，无论是家庭记忆，还是家族记忆、社区记忆、城市记忆、民族记忆、国家记忆等共同体记忆的建构都离不开档案的参与。现今我国提出要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需要培养公民的档案素养，使共同体成员能形成和妥善保管有关共同体的记录，并积极参与共同体记忆建构，同时，记忆机构也需积极发挥在共同体记忆建构中的作用，做好共同体档案的捕获、组织、展演、聚合等工作，促进共同体记忆的建构与传承。

Archiv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Memory

LIAN Zhiying

(School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Renmin University)

Abstract: community is constituted by a group of people linked by common characteristics. It can provide individuals with a sense of identity, security, and meaning, and can also promote the maintenance of social order and social integration. The formation of a community is rooted in shared memory of its members. Community archives are the mediated memory texts of a community's past, and are therefore the important media and tool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community's memory. Using archives to construct a community's memory is a continuing process, which includes five dimensions. They are the creation, capture, organization, representation, and pluralization of archives. The archives created by a community's members need to be captured into the framework of this community, and to be organized to form the community archives, and then the community archives narratives will be created by the explor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and the affect contained in archives and will be shared by the community's members, thus constructing the community's memory. Different community archives can be agglomerated to form bigger community archives, and a bigger memory of the community and even that of all human beings can be constructed by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archives, thus promoting the building and developmen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Key words: Archives; Community; Community memory; Records continuum; Memory continuum

(责任编辑 林 间)